



抗战老兵朱超:拿起“文艺武器”同敌寇战斗

□ 记者 杨晓莉

在那战火熊熊燃烧、硝烟遮天蔽日的岁月里,有这样一群别样的战士,他们将文艺视作长枪,把歌声当作子弹,在另一个看不见硝烟却同样激烈的战场上,凝聚起民族的磅礴斗志,点燃了理想的璀璨火焰。现居住在高邮镇南海社区的百岁抗战老兵朱超,便是一名“文艺战士”。

近日,记者走进朱超的家中采访,尽管已是百岁老人,但他精神矍铄,谈吐幽默风趣,又透着谦逊平和。谈及自己的抗战生涯,他感慨自己比太多战友都要幸运;聊起自己的“抗战话剧”,他淡淡地说“只是做了该做的事”;说起如今的生活,他脸上泛起温暖的笑容:“这些啊,都离不开党和人民。”

共产党一心为民 广大群众真心拥护

1926年,朱超出生在革命老区涟水县。得益于不错的家庭条件,他自幼便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,这为他日后的人生选择与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朱超回忆往昔,老家因地处革命老区,一直被日伪顽三股势力三面包围,战火频繁,硝烟从未散尽。1942年之前,老家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之事,至今仍深深刺痛着他的心。一名日军少校军官掉队后迷失方向,被当地民兵发现后果断击毙并掩埋。日本人得知消息后,如恶狼般气势汹汹地前来寻找尸体,妄图捉拿那名英勇的民兵,却始终未能如愿。恼羞成怒的他们,竟将罪恶的魔爪伸向无辜村民,残忍地杀害了一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

“正是这件事,让我目睹了鬼子的残暴行径,参军的念头自此在我心中熊熊燃起。”朱超神情凝重,声音略带颤抖地说,“那些日本人恼羞成怒,三番五次跑到我们这儿搜查,非要找到那具尸体,可怎么都找不到。他们冲进我们庄上,一个爷爷辈的老人没来得及跑掉,躲在草堆处被他们捉住,当场就被杀害了。当时那惨烈的场景,对我的冲击实在太大了,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

朱超接着说道,当时,国民党三十三师和五十七军常常在此驻扎。这些国民党士兵犹如一群豺狼,在群众中肆意妄为,搅得当地鸡犬不宁。而那些军官们,则一心只走所谓的“上层路线”,与地主资本家勾结在一起,狼狈为奸。当地群众对他们充满了恐惧,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避之不及,根本不愿与他们有任何接触。

1940年,共产党的民运工作队来到了这片土地上。队员们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

党的方针政策,凡事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,还主动帮群众排忧解难、办实事。“不久后,共产党部队南下经过我的家乡。我亲眼看到了部队纪律之严明,他们严格遵守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。”朱超回忆道,驻军期间,战士夜间从不进入村民家中;与群众交流时,态度和蔼可亲;离开前,不仅会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,还会帮村民把水缸挑满,归还所有借用的物品,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

同年10月,共产党部队前往盐城阜宁县一带建立民主根据地,组建苏北行政公署,并创办了抗日大学、鲁艺工作团、青年干训班、苏北行政干部学院等各类学校和训练班。朱超说:“当时我正在阜宁县郭树张庄的联立中学读书,校长是许得良,教育长是林觉。”在校期间,除了学习文化课程,校领导还经常作政治形势报告,开展阶级教育,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途与远大理想。朱超的内心犹如被点燃的火炬,逐渐坚定了参加共产党、投身革命阵营的决心,从此踏上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征程。

冲破阻碍投身革命 在干训班中锤炼成长

1942年,朱超正式踏上革命的征程。回首参军这段历程,可谓是一波三折。

早在1941年秋,革命的种子便在朱超心中悄然种下,他萌发了参加抗大的强烈念头。然而,当地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水,道路被汹涌的洪水淹没,最终未能成行。但革命的火种一旦点燃,便如燎原之势,再也无法熄灭。“我满脑子就想着要参加革命工作,一刻也等不及了。”1942年5月,怀揣着对革命的无限向往,朱超回到家中,满心欢喜地与父亲商谈外出参加革命的事。可他万万没想到,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。只因他是家中长子,父亲一心想让他留在家中主持家务,延续家族的香火与责任。

面对父亲的反对,朱超心里十分痛苦,但革命的信念却愈发坚定。“没办法,我只能悄悄行动。趁着夜深人静,我轻轻地把手生活用品和衣物收拾好,打成了一个小包袱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微微眯起眼睛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月光朦胧的清晨。“那天,天还没怎么亮,月光朦朦胧胧的,我悄悄来到家院的小墙头,心里头既激动又有些愧疚。激动的是我终于要踏上革命的道路了,愧疚的是没跟家里人好好道个别。”他轻轻一翻,便越过了墙头,毅然决然地朝着革命队伍的方向奔去。

离开家后,朱超来到了位于阜宁县的青年干训班。“到了这儿,我才真正知道了啥叫军事化生活。”老人笑着说,“晚上,别人早已进入梦乡,我却竖着耳朵,全神贯注地听那点名点的哨声。清晨,天还黑咕隆咚的,伸手不见五指,我就得迅速起床出操。那整齐的步伐在操场上‘嗒嗒’地响,就像奏响了一曲激昂的战歌,可带劲了。”

每周,干训班还会举行一次紧急集合,且大多在晚上或深夜。“这跟实战演练差不多,通过训练,大家的应变能力都提高了不少。”老人感慨道,一日三餐,时间特别紧,每餐就只有几分钟。白天上课,条件十分简陋,没有舒适的桌椅,大家就把背包当凳子,膝盖当课桌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听课的热情。课程主要是听领导作政治形势报告,内容丰富深刻。朱超每次听报告,都听得入迷,心中对革命的信念愈发坚定。

当时,敌情复杂多变,学员们随时都做好了参加战斗的准备。“干训班就几十个人,秦明担任行政组长,我当学习组长。大家齐心协力、团结友爱,就算生活再艰苦,也没一个人喊苦喊累的。”老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,“我们相互鼓励,相互支持,就为了一个目标——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,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”

约两个月后,情况变得十分紧急,日伪军计划下乡大扫荡。“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,



决定让大部分学员回原籍‘打埋伏’,等待通知,只留下少数党员。”朱超老人回忆道。敌人扫荡结束后,他接到通知,青年干训班停办,随后被转入苏北行政干部学院,后来又进入淮安文工团。“从那以后,由于种种原因,四十多年我都没回过家,心里头其实一直惦记着家里人。”老人眼中闪过一丝思念,“直到1986年,老母亲病危,我才匆匆赶回家探望。那场面啊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

加入文工团扎根革命 以文艺为刃助力抗战

1943年,三十余人的淮安文工团正式组建,年轻的朱超成为其中一员。他们坚守敌后根据地,通过高唱抗日救亡歌曲、排演淮戏等形式,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抗日救国思想。起初,朱超对戏曲一窍不通,但他边学边演,先后在《眼前报》《照减不误》《运河边》等剧目中,成功塑造了游击队员、区民运工作者、贫下中农等多个鲜活角色,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反封建阶级教育,让革命的思想如春风化雨般深入人心。

文工团的生活异常艰辛。由于游击作战的特殊性,他们每天都要转移,有时一晚上要转移多次。夜行军时,“伸手不见五指”,只能循着脚步声摸索前进,往往天亮时才停下。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,他们常住在老百姓家灶灶后的柴火间。棉被狭小不够盖,就铺上稻草,战友们还乐观地编出“铺稻草盖稻草,一觉睡到早饭好”的俗语。夏天蚊虫肆虐,没有蚊帐只能整夜拍打;日常饮食以白菜为主,司务长偶尔买些黄豆改善伙食,吃肉更是奢望;遇到头痛伤风,也只有“多喝白开水”这一“治疗方案”。

即便如此,文工团的同志们始终保持昂扬的乐观精神。他们编了段顺口溜调侃生活:“八角斗篷防雨晒,屁股也能戴;青菜萝卜家常菜,有滋有味吃得好欢快;二斤半小被子身上盖,相互取暖挤成一块……”字里行间,满是革命战士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的豁达。在此期间,凭借出色表现,朱超当上了文工团分队长。1944年,他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45年,新四军对淮阴城发起总攻,朱超带领战友们,冒着枪林弹雨跃过护城河。他们身兼数职,不仅要争分夺秒地抬伤员、运烈士,还要声嘶力竭地宣传鼓劲、细致入微地了解敌情,更要随时做好加入

战斗或阻击日军援军的准备。战斗中,新四军第三师特务团七连五班班长徐佳标背插战旗冲在最前,面对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,他毅然扑上去用身体堵住枪口,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。“徐佳标牺牲了,他是头一个冲到敌人据点……”回忆至此,朱超声音低沉,眼中泛起泪光。

淮阴城解放仅8天后,在祝捷大会上,朱超带领文工团战友们献上了仅用五六天创作完成的五幕七场话剧《淮阴之战》,剧中生动再现了徐佳标的英雄事迹。“演出时,下面老百姓一时有掌声,一时有哭泣声。”朱超解释道,“老百姓饱受欺凌与压迫,终于解放了,他们哭的是苦尽甘来,是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。”

除了文艺创作与宣传,文工团还多次直接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中。一次早饭过后,得知阜宁城出现敌人,朱超与战友们迅速拿起武器、戴上钢盔,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。战斗中,为掩护战友,朱超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。敌人见他戴钢盔、穿黑大衣,误以为是“大干部”,当即用机枪疯狂扫射。朱超瞬间倒地不起,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,悲痛不已。幸运的是,子弹仅打在了他的帽子上,并未造成致命伤害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文工团改编为苏北文工团,朱超仍担任分队长一职。他带领战友们继续以文艺为武器,宣传党的政策、控诉日伪的罪行,让革命的声音传遍每一个角落。

解放后,朱超历任地方干部,将革命精神融入和平年代的建设工作中,继续发光发热。他与同为军人的妻子樊发吾在部队喜结连理,相互扶持,共同走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。如今,夫妻俩依然相濡以沫,在高邮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晚年生活。

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,始终深深烙印在朱超的心中。他记得淮安鼓楼的轱辘,更记得战士们“人堵枪眼”的壮烈。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今天的幸福生活时,他坦言:“我们不能忘本,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烈们。只有国家强盛了,我们才能拥有长久的和平,人民才能安居乐业。”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